

瑞典的國家認同—— 從福利國家到多元文化社會的挑戰

紀舜傑

淡江大學教育與未來設計學系副教授

摘 要

瑞典的國家認同並非靜止不變的固定要素，而是隨著王權國家、民族國家、福利國家到多元社會與集體安全體系等不同歷史階段而被持續建構的想像共同體。若從國家認同理論視角來看，瑞典一方面延續了以語言、歷史記憶與宗教傳統為基礎的族群民族主義元素，特別是瓦薩王朝、新教國家教會與瑞典帝國的榮耀記憶所提供的歷史素材，另一方面又在 20 世紀社會民主主義與福利國家建構過程中，逐步發展出以公民權、民主制度與社會平等為核心的公民民族主義，使何謂瑞典人的要素更緊密連結於制度認同與價值實踐，而非血緣與宗教歸屬。瑞典的未來挑戰，不是在找到一個同質且榮耀的歷史想像，而在於能否在多元與安全、包容與差異之間，持續透過民主程序與公共辯論，重塑一種既具開放性又有凝聚力的國家認同。這其實也是當前各國在面對全球化與區域整合的發展中，經常面對的挑戰。

關鍵詞：瑞典族群民族主義、公民民族主義、中立政策、北約

壹、前言

身為在 1970 年代長大的小孩，筆者對瑞典（Kingdom of Sweden）的認識不是從地理課本或正式教育體系中得知，而是經由幾個具代表性的文化與工業符號進入日常生活，例如流行音樂中被譽為瑞典國寶的 ABBA 樂團、經商的鄰居家中 Volvo 汽車，以及當時享譽全球的男子網球球王 Björn Borg。這三個在流行文化、汽車工業與運動領域的國際閃亮巨星，構成了我對瑞典的最初印象。全球化時代後，瑞典家具店 IKEA 成為是全球最強的「瑞典符號」之一，它的產品走簡約，功能取向，並融入所謂的民主設計（democratic design），充分發揚瑞典人的「拉格姆」（Lagom）心態，此心態就是強調恰到好處且不多不少。將瑞典平等、平實、環保的價值融入生活家具中，IKEA 在全球的門市，都將瑞典國旗的藍黃色調作為其清楚的商標旗幟，等同懸掛瑞典國旗一般（Vitsenko, 2023）。

以全球觀點來看，諾貝爾獎應該是瑞典在世人心中最顯明的標記。諾貝爾獎由瑞典人阿爾弗雷德諾貝爾（Alfred Nobel）創立，他在遺囑中指定物理、化學、生理或醫學、文學獎由瑞典機構頒發，典禮固定在斯德哥爾摩舉行，只有和平獎是在挪威頒發，此乃因為瑞典與挪威的歷史聯盟達成的協議。諾貝爾獎對瑞典人的國家認同有顯著正面影響，明顯提升國家榮譽感，開創國家的柔性國力，也清楚地塑造國際形象，並成為瑞典文化與科學聲譽的主要象徵。雖然獎項本身是國際性的，但它讓瑞典人將自己視為創新、進步與人文關懷的代表（Meetings International, 2025）。

瑞典也長期被視為北歐福利國家典範，以高度平等、世俗化、自由價值與國際主義著稱。經常被稱為是「社會民主型」福利國家，與其他鄰國形成的北歐模式在國際上具高度象徵性。從相關實證研究也看到，瑞典等北歐國家在性別平等、世俗化及自由價值指標上長期居於世界前列，並在多邊主義與國際人權議題上扮演積極角色（Inglehart & Norris, 2003）。

瑞典的中立政策也是非常顯明的國際形象，中立政策不只是瑞典現代政治發展與國家認同的要素，並與所謂「瑞典例外論」（Swedish Exceptionalism）緊密相連。此一政策起源於 19 世紀初，瑞典在拿破崙戰

爭中遭受重挫並失去芬蘭後，逐漸放棄傳統強權競爭路線，轉而採取以避免捲入歐陸大戰為核心的安全戰略。自此，「承平時不結盟，戰時力求中立」不僅成為對外政策原則，也逐步內化為國家安全文化的一部分。20 世紀兩次世界大戰期間，瑞典均採取武裝中立立場，但是仍然維持相對充足的軍備，只是以謹慎而具彈性的外交手段在交戰陣營之間調整距離，成功避免直接捲入戰事。冷戰時期，瑞典在名義上維持軍事不結盟與戰時中立，但實際上與西方陣營在情報與防務領域保持緊密合作，形成表面中立但實質西向的立場。這種安排既維繫了中立國形象，也為安全提供保障。冷戰結束後，瑞典則由傳統中立逐步轉向軍事不結盟與積極國際主義，一方面加入歐盟並參與共同外交與安全政策，另一方面積極投入國際維和、裁軍談判與發展合作，進一步鞏固其作為道德強國與和平仲裁者的國際形象。

這種瑞典例外論將高度現代化與工業實力與超然於大國權力政治的自我定位結合起來，使中立與不結盟不僅是安全策略，也成為瑞典在國際秩序中自我標榜之例外地位的基礎。然而，俄烏戰爭及歐洲安全環境劇變，促使瑞典申請並加入北約，顯示中立政策已由嚴格的武裝中立，演化為以多邊安全與同盟為核心的新安全策略，標誌著這一歷史傳統的重要轉折與瑞典例外論內涵的重新界定。

本文的討論重點在於透過瑞典的歷史以及國家發展方向，探究其歷史發展與國家認同的重要因素與其轉變，例如上述的中立政策，以及宗教、語言等認同要素對界定瑞典性（Swedishness）的影響，也會討論中立政策的轉變與加入歐盟與北約對瑞典的意義。

貳、國家認同的理論整理

國家認同向來被視為一種高度複雜且多維度的概念，涵攝政治制度、文化符碼與社會結構等層面，其核心問題在於如何劃定「我者」與「他者」的邊界。這種邊界並非單純出自個人主觀感受，而是深植於權力關係與價值體系之中，透過制度、話語與日常實踐不斷被建構與再生產。民族主義在此過程中扮演關鍵角色，它透過建構共同歷史敘事、文化記憶與情感想像，界

定哪些群體被納入國家共同體，哪些則被排除於外。以族群民族主義（*ethnic nationalism*）為例，其強調血緣出身、族裔歸屬、宗教信仰與語言文化等先天或早期社會化因素，視之為身份歸屬的主要基礎。此一取向往往強化「我們／他們」的二元結構，具有明顯的界線劃分與排他傾向，易為社會緊張與衝突提供條件。

Smith（1991）將「民族」界定為一群具有專屬名稱、與特定領土相連結，並共享神話、歷史記憶與象徵文化的人群。民族的情感黏著力，主要來自對共同過去的敘事與一套穩定運作的象徵體系，包括民族名稱、集體記憶、共同故土與儀式實踐等。這些象徵經由神話傳說、歌曲、節慶與紀念活動在日常生活中反覆被再現，使文化傳統得以延續，同時持續重申「我們是誰」的集體界定。民族主義研究因此不僅關注客觀結構，亦強調情感、象徵與想像在身份認同中的作用。

相對地，公民民族主義（*civic nationalism*）在理論上具有較強的開放與包容特質。Anderson（1983）將民族理解為一種「想像的政治共同體」，指出民族並非自然存在，而是在特定歷史脈絡下，透過語言媒介、制度安排與權力運作被建構出來。於此視角下，國家認同不再被還原為血緣的延伸，而是建基於對共同制度、權利與義務的認同。不同文化群體在國家空間中，就資源分配、象徵地位與政治代表性展開競爭與協商，固然可能加劇認同上的緊張與撕裂，但也創造了對話、妥協與重新界定「我們」範圍的可能性。在多元社會情境中，公民民族主義提供了一種以法律平等、權利保障與多元尊重為基礎的國家認同模式，試圖在維持共同體凝聚力與接納差異之間取得平衡。

Connor（1993）進一步區分民族主義與國家認同在指向與情感內涵上的差異：民族主義往往圍繞民族共同體的獨特性與優越感展開，強調特定群體的歷史連續性與文化純粹性；國家認同則以國家作為整體政治共同體的對象，若其建構基礎是公民資格、憲政原則與程序正義，便具有相對較高的包容性，能容納多重族群與文化差異，為多元社會提供最低限度的共同基礎。此種以國家為核心的認同，在理論上有助於弱化族群界線的絕對性，使不同群體得以在共享制度框架下共存。

在全球化與跨國流動日益頻繁的當代，如何在面對極端民族主義、排外情緒與身份政治興起的同時，發展具包容性的國家認同，已成為理論與實務上的迫切課題。一方面，國家認同仍仰賴「我者／他者」的差異化建構；另一方面，尊重多樣性與保障弱勢群體權利又是維持社會穩定與民主正當性的前提。近年的研究強調，國家認同的形塑不應僅停留在國家與精英論述層次，也必須關注少數族裔、新移民與新興身份政治主體如何在與國家制度互動的過程中，協商並重塑自身位置，從而凸顯國家認同的流動性與開放性（Bratcher, 2020）。綜合以上觀點，可見民族主義與國家認同之間的關係並非單向，而是兼具排他與包容、穩定與變動的雙重面向：族群民族主義強化特定界線與忠誠，而公民民族主義則嘗試以制度化平等與多元共存為基礎，為多元社會的長期和平與共融提供可能的規範框架¹。

參、瑞典的認同與歷史發展

瑞典民族認同與國家認同的形成，可以簡稱為是自中世紀由王權與宗教，一路走過民族國家、現代福利國家、到近來的多元社會的長時間變遷過程。16 世紀瓦薩王朝（Gustav Vasa）的建立與路德教派國家教會的確立，使原本鬆散的貴族政治與區域聯盟，逐步形成一個具備軍事與稅收能力的領土國家；瑞典王國透過教會、軍役與稅制直接觸及臣民，為後來「瑞典民族」想像提供制度基礎（Suryani & Cangara, 2024）。瓦薩國王將瑞典從丹麥統治中獨立出來的英雄，也被視為是瑞典的第一個開創民族與國家的領袖（Olofsson, et al., 2017）。

在 17 世紀的瑞典帝國時期（*Stormaktstiden*），瑞典在波羅的海地區進行軍事擴張，讓瑞典成為基督新教強權與軍事帝國的地位，這時期強大的瑞典成了後代在追尋光榮傳統的重要源頭，是瑞典民族的榮耀歷史，也是近代民族主義的一個重要元素。

19 世紀歐洲民族主義興起後，瑞典雖在拿破崙戰爭後喪失芬蘭，但逐

¹ 本段理論討論改寫自紀舜傑（2024）。

步在與挪威的聯合王國架構中，發展出以瑞典語與路德教會為核心的民族國家論述。語言、歷史與農村習俗被視為真正的瑞典性，這是一種原生文化同質化過程，即透過教育制度、徵兵與國家教會，地方與階級差異都被整合成單一「瑞典人民」形象，形成一種文化同化的民族建構與國家認同路徑。同時，19 世紀末至 20 世紀初的大量瑞典人向北美移民，也間接對瑞典的國家認同產生衝擊，一方面人口外流被視為社會危機，促使國內反省改革；另一方面，移民社群在北美維繫的瑞典性記憶，後來瑞典公共媒體與歷史敘事中強調堅忍、勤勞與新教倫理的重要瑞典元素，後來成為瑞典性的重要的一部分（Andersson, 2025）。

20 世紀社會民主主義的興起，則透過「人民之家」(*folkhemmet*) 概念，將國家重新想像為一個以平等、合作與社會保障為基礎的家。自 1930 年代起，福利國家不僅是一套分配制度，更成為瑞典文化自我理解的核心意象。瑞典被塑造為溫和理性且高度組織化的社會民主典範。在此框架下，瑞典性與普及福利制度、性別平等與工會參與同等重要，形成一種以民主和社會正義為本的「民主民族主義」。從瑞典憲法上我們可以清楚看到這種民主民族主義：

- 一、公民而非民族：認同基於人民，而非血統或民族，強調平等公民權與意見自由。
- 二、平等與包容：尊重所有人的平等價值，禁止歧視，體現多元社會的包容性。
- 三、務實民主：憲法的前言並沒有慷慨激昂，只強調實質權利與福利，認同來自共享的民主制度與社會安全網，而非神話或歷史英雄。
- 四、北歐與歐洲定位：憲法允許歐盟整合（經公投），但強調主權在人民，體現「北歐例外主義」與歐洲認同的平衡。

然而，有研究指出，這種自我理解同時內含一條隱性的道德界線：那些被視為不共享相同價值者，被默默排除在「人民之家」之外（Helander, 2024）。

冷戰結束與 1995 年加入歐盟之後，瑞典逐漸由相對單一文化的新教福利國家，轉型為高移民比例的多元社會。瑞典一方面延續其普遍主義與平等主義的國家走向，另一方面又必須面對移民與難民增加所帶來的認同、

福利分享與政治安定等多重挑戰 (Suryani & Cangara, 2024)。教育與歷史教學在此成為關鍵場域，學校所傳遞的國家歷史仍高度集中於維京人—瓦薩王朝—帝國—工業化—福利國家的連續敘事，移民、殖民與全球關係多被邊緣化 (Astrom, 2017)。另外，移民背景學生在歷史科與國家測驗中的系統性弱勢，顯示現有歷史教育與評量框架仍主要反映多數族群的經驗，從而影響教育公平與歸屬感的建構 (Alven, 2021)。

肆、認同調查實證資料發現

在皮尤研究中心 (Pew Research Center) 的跨國研究中，發現瑞典在「成為真正的國民」所需條件上，屬於相對開放的一端。此研究針對多國進行調查，受訪者被問及「在本國出生」、「信奉多數宗教」、以及「會說本國語言」等條件對成為「真正的國民」是否重要。瑞典受訪者中，認為「在瑞典出生」是「非常重要」條件者比例明顯低於多數歐洲國家，而認為「信奉主要宗教」重要者比例亦相當有限；相對之下，「能夠使用瑞典語」則被視為更為關鍵的認同標準。此一結果顯示，瑞典國家認同較少建基於出生地與宗教之排他邊界，而是更重視語言與文化實踐所構成的公共生活 (Stokes, 2017)。

我們若進一步採用皮尤研究中心所建構的「國家認同指數」(national identity index)，可以更清楚看出瑞典在全球比較中的特殊位置。該指數綜合了「語言、傳統、出生地與宗教」等多項條件的重要性評價，數值愈高代表受訪者傾向以較為排他、條件嚴格的方式界定國族成員。2024 年的調查顯示，瑞典在所有受訪國家中得分最低 (約為 2.37)，顯示整體而言，瑞典受訪者對「成為瑞典人」的條件持相對寬鬆與開放的態度。

儘管瑞典在國族認同條件上相對開放，語言與文化傳統仍扮演重要角色。皮尤研究中心 2024 年的調查顯示，瑞典受訪者中，仍有多數認為「會說瑞典語」以及「遵守瑞典的風俗與傳統」是成為真正瑞典人的重要條件，但對「在瑞典出生」與「信奉瑞典多數人所信的宗教」之重視程度則明顯較低 (Huang, et al., 2024)。由此可以看出，瑞典國家認同一方面弱化了出生與宗教作為排他門檻，另一方面仍透過語言與日常文化實踐維持某種「文

化邊界」。在移民與族群多元化加速的情境下，此種以語言與實踐為核心的認同模式，也遭受一定程度的張力與再協商。2016 年的研究指出，雖然瑞典在歐洲國家中相對較傾向將種族與民族多樣性視為正面發展，但社會內部對多元化是否「有利國家」仍存在意見分歧（Wike, et al., 2016）。

另外從國家自豪感的角度觀察，「成為瑞典人」的正面想像亦與民主與福利國家制度緊密相連。皮尤研究中心最新調查就「使人對其國家感到自豪的因素」進行跨國調查，瑞典受訪者經常提及「正義與民主」「福利與社會平等」「人民本身」作為主要自豪來源，有受訪者甚至直接將瑞典描述為「一個正義與民主的國家」（Silver, et al., 2026）。這顯示，瑞典的國家認同不僅建構在文化與語言邊界之上，同時也非常著重於對民主制度、社會平等與福利國家的價值認同。意即「什麼是瑞典人」的意涵是對特定政治與社會制度之認同，而非僅僅是族裔或出生地的原生要素。

然而，也有相關研究發現，即便在強調包容與多元的實踐中，瑞典性仍蘊含大量潛在的文化與族群規範。當代瑞典文化與國家認同的論述分析顯示，許多被視為正常的行為模式，例如重視個人空間、低衝突的溝通風格、高度世俗化與低調的中產階級生活方式，實際上是特定多數族群的文化習慣，卻在公共論述中被自然化，結果使非白人或非主流宗教背景者被默默置於他者（others）的位置。即使受訪者在表面上都對多元文化高度支持，但潛意識中仍普遍將「瑞典性」與「白人北歐多數」強烈連結的傾向，顯示包容語言與深層認知之間存在顯著落差（Olsson, 2026）。

進入多元文化社會後，瑞典性被不同政治力量以相反方向動員。一方面，社會民主與自由派政黨傾向將瑞典性與民主、人權、性別平等與環境保護等進步價值緊密結合，維持開放式民主民族主義敘事。另一方面，民族保守與極右政黨（如瑞典民主黨）則將瑞典性重新界定為需要被捍衛的文化與族群性，強調歷史深度、血緣與文化連續性，將穆斯林移民與非西方背景描繪為難以同化的威脅，形成排他性強烈的國族想像（Gendolavigna, 2025）。主流政治與公共媒體則在進步、寬容的瑞典與必須捍衛核心價值的瑞典之間拉扯，顯示國家認同不斷在多元與同質、安全與開放之間被重新協商（Andersson, 2025）。

多元社會帶給瑞典新的挑戰，認同的基礎與對象也出現不同的論述與主張，一方面，福利國家在全球化與財政壓力下出現困難，引發誰有資格分享人民之家資源的政治爭議；另一方面，移民與難民議題被極右力量透過懷舊的瑞典性敘事，重新包裝為「失落的傳統瑞典」與「被威脅的國族家園」。(Rydgren, et al., 2018) 以下我們便針對這些挑戰進行討論。

伍、右派政治勢力的影響

自從 1990 年代以來，瑞典在全球化與冷戰結束的背景下，由傳統移民輸出國與勞工移入國，逐漸轉變為高度依賴國際移民與難民接收的移民社會。在 1990 年代初期，隨著南斯拉夫解體與巴爾幹戰爭爆發，瑞典成為歐洲接收前南斯拉夫難民的重要國家之一。瑞典政府當時延續自 1970 年代以來的人道庇護與國際責任論述，採取相對開放的庇護政策，使大量來自波士尼亞、科索沃等地的難民在 1990 年代獲得居留權，並被安置於全國各地中小城鎮與郊區住宅區，為當代瑞典族群與宗教多元化奠定人口結構基礎。

進入 2000 年代後，瑞典移民組成日益多元，來源國從歐洲戰亂地區擴展至中東、非洲及亞洲。伊拉克戰爭之後，瑞典成為歐洲接收伊拉克難民比例最高的國家之一。同時，來自伊朗、索馬利亞、厄利垂亞與阿富汗的庇護申請亦持續增加。官方統計顯示，截至 2010 年代中期，外籍出生人口已佔瑞典總人口的約 15%，而到 2024 年底，外國出生人口約達 216 萬人，約佔全國人口的 20% 左右，顯示移民與難民已在數量上成為重塑瑞典社會的結構性力量 (Századvég, 2025)。

2015 年歐洲難民危機被普遍視為瑞典移民與認同政治的分水嶺。根據研究與官方統計彙整，瑞典在 2014 至 2016 年間接收了逾 14 萬名來自敘利亞與伊拉克的庇護申請者，是歐盟中按人口比例接收最多難民的國家之一 (Agafoshin, et al., 2022)。這些難民多被安置於此前外籍居民比例較高的郊區住宅區與中小城鎮，但隨著時間推移，其地理分布逐漸與本地人口結構趨同，顯示瑞典在住房與地方政府層級上進行了相對廣泛的分散安置政

策。歐洲難民與流亡者理事會的國別報告指出，瑞典移民局自 2015 年後改採較為嚴格的庇護與家庭團聚標準，但仍維持歐盟範圍內相對較高的保護接受率。

進入 2020 年代，瑞典在新冠疫情、烏克蘭戰爭與內政政治右轉的交織影響下，移民與難民政策趨於收緊。主要申請來源為敘利亞、烏克蘭與阿富汗，顯示瑞典已從 2015 年危機時期的「高接收國」轉為中等規模但高度政治化的移民接收國（OECD, 2025）。

瑞典的右派勢力主要指的是瑞典民主黨（*Sverigedemokraterna*, SD），這是一個從 1980 年代崛起的民族主義民粹政黨。自 2010 年進入國會後，瑞典民主黨支持率穩步上升，2022 年大選後成為議會第二大黨，並透過政黨協議支持中間偏右派少數政府（溫和黨、基督教民主黨、自由黨），實質掌握政策影響力，使得瑞典民主黨反移民與文化保守主張重塑國家認同的論述與政策走向，從瑞典原本公民主義、包容的人民之家模式，逐步轉向更強調文化同化與瑞典價值優先。

瑞典民主黨重新建構人民之家的核心概念，將傳統以強調平等福利與公民契約的國家認同內涵，轉換成懷舊化與民族化，強調過去的光榮時代為安全、同質、共識的社會，而當前因大量移民導致的平行社會與文化衝突。這種認同轉換，讓人民之家從包容性福利國家，變成需要文化同化才能進入的「瑞典人之家」（Elgenius & Rydgren, 2026）。

瑞典保守派政府（受瑞典民主黨影響）公布瑞典文化價值清單，宣稱是「共同參考框架」，用來促進移民融入。瑞典政府強調這是融入條件，但反對者則視為是身份政治與文化童話，將瑞典認同從「公民價值」推向更具體的「瑞典文化」定義（Elgenius & Rydgren, 2026）。

在政府將國家認同論述轉變後，瑞典公民資格與移民政策也將大幅緊縮與管制即將生效的新公民法規定，居住年數從 5 年延長至 8 年，新增最低月薪門檻（約 22,500 瑞典克朗）、語言與社會知識考試。教育與文化政策：推動學校教授文化正典，強調「瑞典價值」融入課程；同時在氣候與性別政策上，在瑞典民主黨的推動下，出現懷疑主流環境論述的氣候現實主義與反性別多元論述，間接強化傳統「瑞典性」。批評者擔憂民主退化與排外情

緒上升，例如發生於 2022 年的復活節之亂（Easter Riots），瑞典極右派人士在多個穆斯林聚居區公開焚燒古蘭經，引發連續數日暴動。抗議者投擲石塊、燃燒警車與學校，警方開槍警告，至少 40 人受傷、數百人被捕。這是瑞典從未見過的群眾暴力事件，右派勢力將其歸因於移民平行社會與犯罪幫派的結合；左翼則指責右派人士的挑釁與警方應對失當，事件成為全國族群關係轉折點。（Henley, 2022）此暴力事件加速移民政策收緊，主流政黨已普遍接受融合優先路線，認為瑞典社會需要緩減激進的多元主張（Reuters, 2026）。相較於過去的開放模式，瑞典政府認同更務實、保守的國家發展。這也呼應近來歐洲右派民粹的共同趨勢，用文化保護與族群傳統重塑國家認同。

陸、中立政策與瑞典的例外論

「瑞典例外論」一直是瑞典人的認同要素之一，這與瑞典引以為傲的中立政策有關。瑞典自 19 世紀初以來奉行的中立與軍事不結盟政策，長期被瑞典人視為是「瑞典例外論」的重要關鍵因素之一。這個例外論將瑞典想像為一個能不捲入大國對抗之間，且能結合小國以現實主義與道德外交，並以「和平仲裁者」與「人道強國」身分自處的特殊國家。這種例外主義不僅是一套安全政策，更逐步內化為國家認同的一（Brommesson, et al., 2022）。然而，從冷戰結束到 2022 年俄烏戰爭爆發，再到 2024 年正式加入北約，瑞典的中立政策經歷了由武裝中立到集體防禦的轉變，也迫使瑞典例外論在新安全結構下被重新建構與論述。

19 世紀初，瑞典在與俄羅斯戰爭中喪失芬蘭，並於 1814 年與挪威爆發最後一場戰爭。其後在卡爾十四世約翰（Karl XIV Johan, 1818-44）的主導下，轉向以避免捲入大國戰爭為首要目標的鐘擺外交，當時是在俄羅斯與英國之間尋求平衡。並於 1834 年正式中立宣言，使承平時不結盟，戰時中立的原則制度化。這種中立並非出於抽象和平主義，而是典型的小國生存的務實計算，即在力量不對稱的歐洲國際體系中，以退居敵對陣營之外換取生存空間（Brommesson, et al., 2022）。

兩次世界大戰期間，瑞典透過彈性靈活的中立政策，達成了實質上的戰時安全，免受戰爭破壞。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瑞典對德國採取善意中立，在航運與物資方面做出讓步，同時對協約國強調形式上的中立。之後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瑞典自稱非交戰國，得以在表面上維持不參戰的同時支援芬蘭對抗蘇聯，並在納粹德國壓力下容許德軍過境。這些政策在事後受到批評，但在當時被視為避免佔領的必要妥協²。冷戰時期，瑞典一方面以從未參戰的和平小國自我定位，強化了瑞典例外的道德資本，另一方面，建立起高度發展的軍工體系與武裝中立，藉由提升軍事科技強化武裝中立的實質本錢。在此過程中，中立政策與「民主、人權與國際主義」的自我形象互相強化，使瑞典例外論同時具有安全與價值雙重面向。

冷戰結束後瑞典於 1995 年加入歐盟，標誌著瑞典從全面中立進入「後中立」階段，即中立不再是一項嚴格的法理義務，而是轉為「軍事不結盟」原則。瑞典積極參與北約的「和平夥伴關係計畫」（Partnership for Peace），並在巴爾幹與阿富汗等地參與維和與危機管理行動，事實上已深度融入西方安全架構，但是在形式和宣傳上仍舊維持中立傳統與瑞典的特別做法（楊三億，2024）。這一階段瑞典例外論的關鍵轉化，在於將不結盟與道德上的國際主義結合起來，把自身定位為超越傳統大國政治、以道德與價值為導向的重要國家。例如瑞典長期支持以色列與巴勒斯坦的兩國方案，並在 2014 年正式承認巴勒斯坦國，是首批承認巴勒斯坦的西歐成員國之一。雖然瑞典並非以巴談判的唯一關鍵調停者，但其在歐盟內部倡議、提供對話平台與發展援助，使其在以巴和平與中東議題上被視為是進步派倡議者。

2014 年俄羅斯併吞克里米亞，對瑞典的安全評估造成重大衝擊。瑞典開始強調與北約和美國的雙邊安全合作與區域防務演習，並重新部署駐守波羅的海要地哥特蘭島（Gotland），顯示瑞典已從「中立觀望者」轉為「實質西方前線」的安全行為者（Zarembaite, et al., 2023），然而真正徹底改變的歷史性轉折，是 2022 年俄羅斯對烏克蘭的戰爭，這場戰爭被視為粉碎

² 可參考觀賞 2026 年上市的電影 *The Swedish Connection*，對二戰期間瑞典與納粹德國在中立政策下的折衝，有深刻的描寫。

了瑞典對中立本身可以帶來安全的最後信念，在像俄羅斯這種核武大國竟敢公然推翻邊界與國際規範的情況下，瑞典如果不依附在條約式集體防禦體系之內，將會是國家安全結構性的致命傷，而不再是以往所堅信的道德優勢（Podvorna 2024）。

加入北約後，瑞典安全戰略由「獨力防衛的武裝中立」轉向「團隊合作的集體防禦」，防禦概念也從單純領土防守擴展為「全民防禦」(total defense) 與社會韌性建構：透過擴軍、提升國防預算、強化民防、關鍵基礎設施保護與心理防線建構，使整個社會成為「國家之盾」。在大西洋化的安全框架下，瑞典例外論並未完全消失，而是轉化為另一種形式。瑞典不再以中立身分自許，而是以擁有高度技術能力、強大軍工體系與民主價值承諾的國家自我定位，試圖在北約框架內繼續扮演規範與人道外交的領先者。從此意義上看，瑞典由中立走向入約，既是對地緣現實的回應，也是對「瑞典例外」之內容與邊界的一次歷史性重寫。

柒、結論

綜合上述討論，我們可以看出瑞典的國家認同並非靜止不變的固定要素，而是隨著王權國家、民族國家、福利國家到多元社會與集體安全體系等不同歷史階段而被持續建構的想像共同體。若從國家認同理論視角來看，瑞典一方面延續了以語言、歷史記憶與宗教傳統為基礎的族群民族主義元素，特別是瓦薩王朝、新教國家教會與瑞典帝國的榮耀記憶所提供的歷史素材，另一方面又在 20 世紀社會民主主義與福利國家建構過程中，逐步發展出以公民權、民主制度與社會平等為核心的公民民族主義，使何謂瑞典人的要素更緊密連結於制度認同與價值實踐，而非血緣與宗教歸屬。

從各種跨國比較調查可見，瑞典在真正的國民條件上是相對開放的，出生地與宗教信仰的重要性被弱化，然而語言能力與遵守本地風俗習慣仍具有一定門檻。由此可見瑞典認同的雙重性質，一方面以語言與日常文化實踐維繫必要的文化邊界。另一方面又將民主、平等與福利國家的制度價值視為自豪來源與認同核心。換言之，「瑞典性」不再只是白人北歐新教農民

社會的延伸，而是在全球化與多元社會脈絡下，試圖結合開放移民政策、性別平等、環境保護與人權價值的一套現代公民敘事。

然而，這種開放與普遍主義的自我想像並非沒有反制。我們也從調查資料中發現，即使在語言上強調多元與包容，正常的瑞典生活方式仍多以多數族群的世俗中產階級文化為潛在標準，使非白人或非主流宗教背景者在很容易成為社會中的他者。多元社會的實際運作中，福利國家資源分配、教育體系中的歷史敘事與學業表現落差，暴露出瑞典引以為傲的人民之家並非毫無邊界的嘉惠所有的人，而是帶有文化與道德條件的共同體。右派民粹與民族保守勢力崛起，更將瑞典性重新描述為需要防衛的文化家園，將移民與難民推為對安全與社會凝聚的威脅，促成公民法、移民政策與教育文化政策的排他甚至差別待遇。

本文也發現中立政策與瑞典例外論同樣是理解其國家認同變遷的關鍵。自 19 世紀以來，和平不結盟但戰時中立曾是瑞典建構為國家形象的策略，透過兩次世界大戰與冷戰的武裝中立執行，瑞典將自己塑造成既超然於大國衝突、又積極參與人道外交與國際主義的道德大國。這種例外論將安全策略與價值認同結合，使中立不僅是現實生存策略，也成為瑞典人區別自我與他者的顯明表徵。然而，俄烏戰爭與歐洲安全結構改變後，中立政策已難再保證安全，特別是當芬蘭決定加入北約，進而改變北歐的安全版圖時，瑞典若繼續自外於集體防禦體系，反而可能成為新的戰略弱點。於是在 2024 年正式加入北約後，顯示瑞典例外論從不結盟的和平國家，轉化為西方集體防禦體系中以道德與科技著稱的重要一員。

最後我們看到，瑞典的未來挑戰，不是在找到一個同質且榮耀的歷史想像，而在於能否在多元與安全、包容與差異之間，持續透過民主程序與公共辯論，重塑一種既具開放性又有凝聚力的國家認同。這其實也是當前各國在面對全球化與區域整合的發展中，經常面對的挑戰。

參考文獻

- 紀舜傑，2024。〈波蘭的國家認同——歷史與文化交織的民族自豪〉《台灣國際研究季刊》20卷3期，頁127-45。
- 楊三億，2024。〈為什麼不中立了？從關鍵時刻、地緣政治與決策模式分析瑞典與芬蘭中立政策調整〉《問題與研究》63卷1期，頁55-101。
- Alven, Fredrik. 2021. “Immigrant Students and the Swedish National Test in History.” *Frontiers in Education*, Vol. 6
(<https://www.frontiersin.org/journals/education/articles/10.3389/feduc.2021.774900/pdf>) (2026/2/26)
- Anderson, Benedict. 1983. *The 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London: Verso.
- Agafoshin, Maksim Mihailovich, Stanislav A. Gorokhov, and Vladimir V. Dmitriev. 2022. “Refugees from Syria and Iraq in Sweden: resettlement during the migration crisis.” *Baltic Region*, Vol.14, No 4, pp. 98-112.
- Connor, Walker. 1993. *Ethnonationalism*.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Elgenius, Gabriella, and Jens Rydgren. 2026. “Who Are the ‘People’ and What Does ‘Home’ Mean? A Case of Frame Transformation and Counter-framing of the People’s Home in the Sweden Democrat Rhetoric 1989-2022.” *Social Semiotics*, Vol. 36, No. 1, pp. 116-29.
- Henley, Jon. 2022. “Sweden’s Failed Integration Creates ‘Parallel Societies,’ Says PM after Riots.” *The Guardian*, April 28
(<https://www.theguardian.com/world/2022/apr/28/swedens-failed-integration-creates-parallel-societies-says-pm-after-riots>) (2026/3/11)
- Huang, Christine, Laura Clancy, and Sarah Austin. 2024. “Language and Traditions Are Considered Central to National Identity.” Pew Research Center
(<https://www.pewresearch.org/global/2024/01/18/language-and-traditions-are-considered-central-to-national-identity/>) (2026/1/22)
- Inglehart, Ronald, and Pippa Norris. 2003. *Rising Tide: Gender Equality and Cultural Change Around the Worl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Meetings International. 2025. “The Nobel Prize: Sweden’s Soft Power Icon.”
(<https://meetingsinternational.com/mi-magazine/features/the-nobel-prize-swedens-soft-power-icon/>) (2026/3/26)

- OECD. 2025.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Outlook 2025*
(https://www.oecd.org/en/publications/2025/11/international-migration-outlook-2025_355ae9fd/full-report/sweden_d3286533.html) (2026/3/11)
- Olofsson, Hans, Johan Samuelsson, Martin Stolar, and Joakim Wendell. 2017. "The Swedes and Their History." *London Review of Education*, Vol. 15, No. 2, pp. 243-58.
- Olsson, Filip. 2026. "Explicit Tolerance and Implicit Exclusion: A Study on National Identity in Sweden."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https://doi.org/10.1111/nana.70053>) (2026/3/22)
- Podvorna, Olena. 2024. "Sweden's Accession to NATO: What Is behind the Decision?" PRIF Blog (<https://blog.prif.org/en/2024/10/17/swedens-accession-to-nato-what-is-behind-the-decision/>) (2026/2/26)
- Reuters. 2026. "Swedish Liberals and Sweden Democrats agree pact to boost right's September election chances." March 13 (<https://www.reuters.com/world/swedish-liberals-sweden-democrats-agree-pact-boost-rights-september-election-2026-03-13/>) (2026/3/11)
- Silver, Laura, Jonathan Evans, Maria Smerkovich, Sneha Gubbala, Manolo Corichi, and William Miner. 2025. "Comparing Levels of Religious Nationalism Around the World." Pew Research Center
(<https://www.pewresearch.org/global/2025/01/28/comparing-levels-of-religious-nationalism-around-the-world/>) (2026/1/4)
- Smith, Anthony D. 1991. *National Identity*. Reno, Nev.: University of Nevada Press.
- Stokes, Bruce. 2017. "What It Takes to Truly Be 'One of Us'." Pew Research Center
(<https://assets.pewresearch.org/wp-content/uploads/sites/2/2017/04/14094140/Pew-Research-Center-National-Identity-Report-FINAL-February-1-2017.pdf>) (2026/3/12)
- Suryani, Desak Sinta Putu, and Abdul Razaq Cangara. 2022. "National Identity and Migration Policy Dynamics: Analysing the Effect of Swedish National Identity on Its Granting Asylum Policy to Syrian Refugees in 2013." *Hasanuddin Journal of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1, No. 1, pp. 1-16.
- Vitsenko, Viktoriia. 2023. "Small Country, Big Impact: Sweden's Soft Power Marvel." Transatlantic Dialogue Center ([https://tdcenter.org/2023/11/02/small-](https://tdcenter.org/2023/11/02/small-Marvel)

country-big-impactswedens-soft-power-marvel/) (2026/3/22)

Wike, Richard, Bruce Stokes, and Katie Simmons. 2016. “Europeans not Convinced Growing Diversity Is a Good Thing, Divided on What Determines National Identity.” Pew Research Center
(<https://www.pewresearch.org/global/2016/07/11/europeans-not-convinced-growing-diversity-is-a-good-thing-divided-on-what-determines-national-identity/>)
(2026/3/22)

National Identity of Sweden: Challenges of Welfare State to Multicultural Society

Shun-jie Ji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and Futures Design,
Tamkang University, Tamsui, New Taipei, TAIWAN*

Abstract

Swedish national identity is not a fixed, immutable entity; rather, it is an imagined community that has been continuously constructed across different historical stages, from the royal state and the nation-state to the welfare state, a pluralistic society, and collective security arrangement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ories of national identity, Sweden has on the one hand preserved elements of ethnic nationalism grounded in language, historical memory, and religious tradition—drawing in particular on the historical resources provided by the Vasa dynasty, the Protestant state church, and the glorious memory of the Swedish Empire. On the other hand, during the twentieth-century development of social democracy and the welfare state, it gradually cultivated a form of civic nationalism centered on citizenship, democratic institutions, and social equality. This has tied the criteria for “being Swedish” more closely to identification with institutions and the practice of shared values, rather than to bloodline or religious affiliation. Sweden’s future challenge does not lie in discovering a homogeneous and glorious historical imagination, but in determining whether it can, through democratic procedures and public debate, continually reshape a national identity that is both open and cohesive, balancing plurality with security and inclusion with difference. In fact, this is also a common challenge faced by many countries today as they confront the dynamics of globalization and regional integration.

Keywords: Swedish ethnic nationalism, civic nationalism, neutrality policy, NATO